

社会科学方法论

跨学科的理论与实践译丛

丛书主编 应 奇

批判理性论

[增订第五版]



*Traktat über
kritische Vernunft*

[德] 汉斯·阿尔伯特 (Hans Albert) 著

朱更生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社会科学方法
跨学科的理论与实践译丛
丛书主编 应 奇

批判理性论

[增订第五版]

*Traktat über
kritische Vernunft*

[德] 汉斯·阿尔伯特 (Hans Albert) 著
朱更生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判理性论:增订第五版 / (德)汉斯·阿尔伯特
(Hans Albert)著;朱更生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
版社,2016.10
(社会科学方法论:跨学科的理论与实践译丛 / 应奇主编)
书名原文:Traktat über kritische Vernunft
ISBN 978-7-308-15910-4

I. ①批… II. ①汉… ②朱… III. ①哲学—理论研
究—德国 IV. ①B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16253 号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1-2016-135 号

批判理性论(增订第五版)

[德]汉斯·阿尔伯特 著
朱更生 译

-
- | | |
|-------|--|
| 丛书策划 | 王长刚 |
| 责任编辑 | 陈佩钰(yukin_chen@zju.edu.cn) |
| 责任校对 | 张远方 |
| 封面设计 | 卓义云天 |
| 出版发行 |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
| 排 版 |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
| 印 张 | 17 |
| 字 数 | 215 千 |
| 版 印 次 |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308-15910-4 |
| 定 价 | 58.00 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http://zjdxcb.tmall.com>

受 浙江大学文科高水平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资助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

“社会科学方法论：跨学科的理论与实践”译丛
丛书主编 应 奇

丛书编委（中文人名按姓氏音序排列）

James Bohman Gunnar Skirbekk

Philip Pettit Stephen P. Turner

陈嘉明 冯 钢 韩水法 刘 擎 罗卫东 渠敬东
盛晓明 童世骏 郁振华 张庆熊 张旺山

献给卡尔·波普尔

总 序

主要由马克斯·韦伯的同名工作确立其卓著声誉和研究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其学理层面的渊源其实应当追溯到新康德主义者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对于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异同的方法论辨析,而其规范层面的驱动力则是由早期现代性向晚期现代性过渡中呈现的社会科学地位问题所折射出来的现代社会对于社会和人想象的转换。就这个研究传统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展开而言,从实证主义向后实证主义的转变是特别值得重视的,正是这个转变及其产生的持续效应,不但破坏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固有的、本质主义的区分,而且推动了社会科学之研究逻辑从聚焦于行动、理由和原因到聚焦于规则、合理性和说明的转化。如果说,后实证主义转变所促成的历史和实践的转向已经把社会科学置于当代科学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中心,那么居今而言,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个本是由跨学科的问题意识所衍生的理论问题本身却已经泛化成了一种跨学科的实践,一个只有通过与社会科学的合作才能完成的计划。

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个论题下的著述,国内学界多年来一直都不乏关注,例如,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温奇的《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

系》，都已经有了中译本，有的还不止一个译本。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套大型的译丛，能够按照这个研究传统本身的脉络，系统地呈现其发展演变至今各个阶段和流派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本译丛将紧紧围绕这个论题的跨学科特质，甄选以下三个层次或方向上的重要著述，请国内学有专长的成熟译者精心翻译成中文出版：一是在元理论层次的工作，我们将遴选近百年来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经典之作，同时将把目光投注于当代最前沿的工作；二是跨学科意识和方法论在某一门或若干门具体人文社会科学中得到集中体现的成果，例如行为主义与后行为主义之于政治学形态的变化，理性选择理论之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适用性，交往行动理论在伦理学和法学上的运用；三是具体的跨学科实践，这方面的重点将是那些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规范含义上都具有示范作用的具有广泛影响的个案研究。

目前入选的著作旨在集中展现后实证主义转向对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的塑造性影响，这是长期以来国内西学译介中的一个巨大盲点。从理论基础而言，后实证主义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哲学家奎因对于经验论之两个教条的著名批判，而其基本的理论信条实际上可以追溯到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这种转变明显地影响到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探讨路径，例如目前几乎已经成为经典作品的温奇的《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就是把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观念推广到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上的一个典范。就社会科学哲学这个领域而言，温奇的著作得风气之先。正是在上述转向和潮流之下，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个理论问题本身逐渐衍化成了一种跨学科的实践，这不仅是指，后实证主义所传递的方法论意识迅速辐射和渗透到各学科例如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研究当中，超越和突破了实证主义的藩篱和局限；而且是指，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其核心部分就是所谓社会科学哲学）本身成了凝聚和整合跨学科研究成果的一个平台。

多年来，浙江大学在跨学科研究上做出了持续的投入，也获得了

相当的声誉。得到浙江大学文科高水平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支持，目前设计的这个译丛既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对于跨学科研究之重要性的认识，也希望能够自觉地回应已经蓬勃开展的跨学科实践。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试图通过这个译丛努力呈现跨学科理论与实践背后真实的问题意识，使得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个看似边缘的论题成为人文社会科学最新进展的聚焦点；同时也将通过这个译丛自身的立意、宗旨和品质，塑造和确立它在国内蓬勃开展的西学译介事业中的独特地位。

应 奇

2016年3月

前 言

前一段时间的讨论中出现一些误解,促使我比原拟更早地实行酝酿已久的计划:写作本书。这些误解关涉卡尔·波普尔以其哲学著作创立的批判理性主义,关涉一种新的批判主义,后者符合一系列努力,它们起始于哲学界的其他代表和科学思维的某些领域,许多年轻一些的作者受这种批判主义影响。尤其在德语区,有人将此哲学观与一种实证主义等量齐观,对后者特性的刻画间或甚至不切合先前隶属于“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在当今的见解,但肯定不切合批判理性主义,后者始终明确反对实证主义的根本论点。须更强调此点是因为此哲学观的批评者自身有时对解释学实证主义心存感激,后者久已在德意志思维中立足,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訾议这种思潮是限制理性的使用,对批判主义的指摘是说它有此类限制,因为:受源于康德之后的德国唯心主义余波的思维方式影响,在启蒙运动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批判的合理性让位于具有准神学特征的一种接受型理性,后者绝非批判性地怀疑既有者,而是满足于自圆其说般的心领神会,而且不惮于迎合一种显然不合理的、充斥着折衷事物的掩饰性思维所作苛求,例如,在现代新教神学中就生发出此种思维。

因为远在15年前,我自己还有些相信此类思维方式,随后一段时间倾向于实证主义和现代经验主义的观点,在这些观点中,启蒙思

想的批判性推力保留的程度远甚于在解释学思维方式中,所以我处于有利地位,既能评估针对批判理性主义所提出的论点由其起源的思潮,亦能评估这些论点真正所指方向。

在本书中,我在局部溯及旧文,尤其是我的文章:《批判理性之理念——论合理论证难题与教条主义难题》(“Die Idee der kritischen Vernunft: Zur Problematik der rationalen Begründung und des Dogmatismus”, in: *Club Voltaire I, Jahrbuch für kritische Aufklärung, herausgegeben von Gerhard Szczesny*, München 1963);《理论与实践——马克斯·韦伯与价值中立问题、合理性问题》(“Theorie und Praxis: Max Weber und das Problem der Wertfreiheit und der Rationalität”, in: *Die Philosophie und die Wissenschaften. Somon Moser zum 65. Geburtstag, herausgegeben von Ernst Oldemeyer, Meisenheim 1967*);还有《合理性与经济秩序——合理秩序政策的基础问题》(“Rationalität und Wirtschaftsordnung: Grundlagenprobleme einer rationalen Ordnungspolitik”, in: *Gestaltungsprobleme der Weltwirtschaft. Festschrift für Andreas Predöhl, Göttingen 1963*)。其他一些问题本也该归入本书框架,但我在别处已经作了论述,在本书中不再赘述,如《伦理与元伦理——分析道德哲学的二难推理》(“Ethik und Meta-Ethik: Das Dilemma der analytischen Moralphilosophie”, *Archiv für Philosophie*, 11/1-2, 1961),还有《社会科学与伦理哲学——社会科学中价值问题评述》(“Social Science and Moral Philosophy: A Critical Approach to the Value Problem in the Social Science”, in: *The Critical Approach to Science and Philosophy. In Honor of Karl R. Popper*, ed. by Mario Bunge, London 1964)。

汉斯·阿尔伯特

1968年1月于海德堡

第二版前言

近一年之后，本书初版售罄，我就有机会再版。我没有考虑改动文本，绝非因为我会认为不可能修订，而是因为我目下无暇再次推敲文本。此外，我想先观望，讨论与本书主题相关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使人愿意超过先前显得合宜的程度，更详尽地论述一些要点。最终，我认为最好以文集形式继续增补、解释，而不以细枝末节拖累本书思路。处理细枝末节会使所分析的问题之间的关联不甚明了，而我尤其看重这种关联。

至于恰恰对德语区而言具有现实意义的解释学问题，不久将有我论述此事的一篇文章在鲍姆加腾纪念文集中发表，其中会详解本书第六章中所探讨的在分析其他方面建议时的解决问题之道。在此语境中，当然也值得分析历史思维的结构和历史作为科学的结构，这种分析超出了本书所作的勾勒。

在另一篇文章中，我想再次深究我在本书中阐述过的待解问题，相关的疑问是，如何能把认识充分应用于对规范性见解的批判，尤其在自律伦理学问题上。我觉得，我并未充分强调此难题具有的相当广泛的意义。这样一个待解问题不仅出现在对伦理学或多或少的自律有待讨论时，而且也出现在哲学—科学的连续性问题的其他地方，

如恰恰在不同思潮之间激起讨论的典型疑问上:如作科学陈述的观察基础这个问题,对精神科学的领悟及与之相关的精神科学在方法论上的脱离主义这个问题,以及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传授这个引证颇多的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一再向我们展示后者,却不会呈现些许清晰的解决之道。我就觉得消除区隔以提高建设性批判可能性是批判主义的要点之一,它意欲压倒合理性的经典模式和与此相连的清晰区隔问题范围,使解决问题之道免疫并使其免受重大批判(尤其在可能将其定位成“由外”而来时)。

在对本书的批评意见中,有人念念不忘分析诸见解,它们在某些视角下被认为如此重要,以致不顾及它们即被视为不可饶恕的错误。如某些读者显然心心念念于探讨康德的理性批判和由此发轫的某些哲学潮流,其他读者则系念于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变体。草率者甚至妄下结论,说我从未研究过康德,故而忽略了其问题与解决之道。此类结论并不因浮现于一种分析语境中就会好多少,人家只会认定这种分析完全不理解所论述的问题情境。面对有些争论样式,或许可以信赖平常读者,他们不会苦于那些易于遮蔽他们思维视野的动机。

在此语境中,我只想再次提请注意,不仅不能在任何重大意义上把批判理性主义描述成实证主义的一种形式(对此可参见我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析,见于《德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之争》)(Adorn / Albert / Dahrendorf / Habermas / Pilot / Popper.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Neuwied / Berlin 1969),而且批判理性主义首先出自分析康德和康德主义的某些形式,并且出自对实证主义的各种变体所作的批判。要认清此点,询求于卡尔·波普尔的相关著作足矣。但此外,我认为,只要读者熟悉康德哲学,就可以指望他们自己得出某些不那么困难的推断。本书确非哲学史论文。显现出的历史性只是粗略的、理想型的、指涉问题的,也就是说,它在我所偏爱的系统化视角下显得必要。我无意写作一部那种

德国式砖头书,系统化的肇端淹没于一堆历史的花饰中。这种书够多了。康德式的萌芽基本上还在古典学术纲要的框架内活动,对这样一种观点而言,我所分析的真理问题与确定性问题的融合是根本性的,在亚里士多德处就可见,知晓他的人可能都清楚,哪怕间或出现其他特征与趋势,我绝不想否认这点。我假定,读者愿意看到对康德的见解和近似的观点的探讨,我至少可以假设,他们知晓这种思维的基础论角度。此外,依我之见,有可能对这种萌芽如此诠释(但那就是以不合历史的方式)或者确切地说是重新诠释,并取代论证难题的是解释问题,这种诠释恰恰在新批判主义视角下呈现。即使在此方面,亦可与当今仍把我们与康德式萌芽联系起来的那些问题建立关系。

汉斯·阿尔伯特

1969年9月于海德堡

第三版前言

本书出版以来,除了赞同意见,我还见到了大量批评性表态,后者促使我给现在出版的第三版配上后记,我试图在其中回应包含于批评性表态中的异议。由于版面和时间原因,不可能逐一展开。我总是试图尽量清晰地突出我与批评者不一致的各观点,而不以听起来可亲的表述加以掩盖。鉴于普遍的共识欣快症开始在德国哲学思维中蔓延,我着重强调,确实的甚或虚假的一致虽然可能让人宽慰,但它们绝不能保障真实,连在引用颇多的理想交际情境中也不会。

我应感谢许多对相同问题感兴趣的同行口头、书面讨论我的看法。除了卡尔·波普尔,我想特别强调下列人员:卡尔·阿哈姆和其他“阿尔普巴赫”之友——E. M. 巴特、阿尔弗雷德·博嫩;曼海姆社会学与知识学教席的助教们——哈拉尔德·德利乌斯、赖纳·施佩希特、汉斯·维尔纳·阿恩特、沃尔夫冈·德特尔、乌尔利希·施泰因福特;1971/1972年冬曼海姆学术研讨课的其他参与者——格奥尔格·盖斯曼、鲁道夫·哈勒尔;格拉茨哲学学会会员——弗里索·D. 海特、诺贝特·赫斯特、彼得·克瑙尔、汉斯·伦克;我们共同的学术研讨课的参与者托雷·努登斯坦,及其卑尔根大学教研室师生——卡里·帕洛宁、伊亚·帕夫沃夫斯卡、欧根·普希奇、热拉

尔·拉德尼茨基、沃尔夫冈·勒德,尤其是保尔·费耶阿本德,他不厌其烦地让我了解怀疑主义的长处。

自我的大学时代起,本书所处理的问题就萦绕不去。20世纪50年代初,我以为接近解决之道了,但这种想法经证实是一种错觉。当时,我形成一种二元论观点,据此,认识与抉择显得完全互不依赖。那时,我把全部认识难题与人类实践相关联,正如当今我的许多批评者所为。分析技术、政治与伦理难题时我似乎产生了对经济思维的根本性批判。实用为本的人类学适合于充当解决哲学问题的基础——于是我了解了现代思维的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性潮流,觉得不得不认清,我之前的观点可能经不起更仔细的检验。卡尔·波普尔的著作中所含的分析与论据最终使我认识到连分析性潮流也面对的困境。

过去15年德语区的发展就引致,与德语区之名相连的哲学思潮出于迥异的原因,也出于最初与哲学问题似乎无甚相干的原因,与那些思想流派发生冲突,后者自20世纪20年代起成为德语舞台所特有,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哪怕别有重点)仍能畅行无阻。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在哲学上可以由源自辩证法和解释学、在政治上十分有效的一种混合体受到启发——称这种混合体为新德国意识形态有些道理(正如赫伯特·马尔库塞这个名字所证明的那样,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具有全球影响)。这场学生运动试图揭露批判理性主义是市民思想的原型,以某种程度上辩证的方式造成了批判理性主义理念与论点的传播。清醒务实的哲学宜于证明历史哲学所支撑的乌托邦思想幻觉是荒谬的(无论出于政治的还是其他原因),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都觉得这种清醒务实的哲学值得质疑。令人生疑这种态度无疑认清了对哲学信念与政治立场的关联。

现在,伴随着所谓趋势转向,似乎有一种醒悟畅通无阻,它抵制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热忱,使人愿意不再诋毁实在主义不喜好解放。激进的政治神学及其一切荒诞之事在有些地方得以被全盘接

受,如今在那里甚至不得不与重重困难作斗争。有谁未学会这种思维的幻想,有谁未把展示给他的对自由理念和机制的蔑视看成不负责任的举止,可以对此感到庆幸。若无某些征兆表明,复辟、偏狭的趋势在蔓延,它们正如 20 世纪 60 年代的激进倾向一样与批判性思维无甚相干。有谁拒绝接受激进类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无由赞许重陷保守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后者受累于政治可能几乎不亚于前者。批判理性主义既无关革命热忱,亦与保守僵化无涉。

汉斯·阿尔伯特

1975 年 4 月于海德堡